

編後語

知識人的身份和使命歷來都是一個頗有爭議的話題，尤其是當社會環境發生深刻變化，應然與實然之間出現巨大落差的時候，喋喋不休的議論自然接踵而至，歸根究底，多少反映出社會大眾普遍對知識人抱持的一份期待。在刻下世界經歷深刻的政治、經濟、科技變革之際，知識人如何在愈益兩極化的時代氛圍下，推動公共文化的建設，以至促進全球正義的實踐，委實令人深思。本期「二十一世紀評論」以「知識人與公共性」為題，配以多篇牽涉公共性討論的文章一併刊出，希望從中國的處境入手，通過方方面面的細部討論，拼湊出一條粗略可辨的思路。

趙鼎新指出，縱然不時有論者談及中國存在或大或小的政治、經濟危機，但他認為近年中國公共輿論空間走向兩極化，社會中間聲音衰弱，才是威脅政權穩定最大的潛在危險，同時呼籲當政者採取適當措施，引導公共輿論返回健康的發展軌跡。榮劍回顧了1949年以來中國知識人曲折坎坷的一頁歷史，尤其剖析了改革開放以來從啟蒙知識份子、專業知識份子到公共知識份子的身份變遷和因由。隨着近年互聯網/社交媒體的發展，知識生產和傳播觀念已然出現重大變化，他認為當下正是公共知識份子出場說話的時代。

本期刊出的學術論文，與二十世紀迄今中國知識人在不同領域的滄桑曲折遭遇多有牽涉。方德萬(Hans van de Ven)從現實政治的角度研究五四運動，指出這場波瀾壯闊的愛國/啟蒙運動其實是由民國初年的憲政危機促成，當時在談判桌上的知識人未能為初生的共和國尋求憲政制度的共識。中共建政後，不少知識人南下香港觀望局勢發展，傅葆石以《中國學生周報》作為個案，深入探討在中美文化冷戰的背景下，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如何通過亞洲基金會資助香港的「第三勢力」進行反共宣傳。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知識人無法從事正常的知識生產，更在極端的政治環境下萌發種種激進思想和行動，董國強、樊建政通過上海「反復辟學會」的個案研究表明，強調二元對立的「社會衝突理論」未能有效展現文革歷史的複雜性。

知識人對國家社會問題表達關注，傳統上靠賴手中的一支禿筆，但隨着科技發展，以紀錄片為代表的影像表達手法，亦成為一種介入社會的媒介。王遲對海內外廣為流行的中國「新紀錄運動」論述提出商榷，全面審視該理論存在的種種問題，並提出另一種理解的進路。若將此文與邱貴芬討論台灣新紀錄片的「景觀」文章並讀，對我們了解紀錄片在兩岸不同歷史脈絡下產生的獨特作用當不無裨益。

葉維麗的長文(分上下篇連載)述說了其父親方實與《炎黃春秋》之間的因緣，並對該刊早期歷史作了一番考證，娓娓道出種種不為人知的辛酸故事，字裏行間洋溢的溫情敬意，相信不難引起知音人的共鳴。